

四川资阳濠溪河遗址

濠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濠溪河上游左岸，西距资阳人遗址直线约35千米。遗址距今约5-7万年，是罕见的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是现代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物质遗存和相关行为要素最丰富的遗址之一，被权威专家论证为“特殊、罕见、价值重大、具有世界性意义”。

遗址发现于2021年9月，因洪水冲垮一水坝及附近河岸发现，同步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11个文化堆积有关联的遗址，构成濠溪河遗址群。2022年、2023年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2023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联合国内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国波尔多大学等)专家团队同步开展年代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埋藏学、微痕与残留物等多学科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

地层与年代 遗址地层平均约7.5米厚，堆积连续且清晰，初步可分为3套大的沉积单元。最上部约4米主要为黄褐色及红褐色粉砂质粘土，无文化遗物；中部约1.8米为灰黑色粉砂质粘土，呈明显水平或波状层理，底部存在明显侵蚀面，为湖相沉积，仅最底部与文化层交错地带零星有石器、化石；最下部约1.7米为红褐色粘土质粉砂，为主要文化层，共分为6层，包含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部分区域被上部湖相层严重侵蚀。底部为红褐色白垩系砂、泥岩的基岩。

经初步但系统的环境考古与埋藏学分析，遗址为古人类多次在水边的占据并随着水的进退而人类栖居的进退所形成，文化层基本为原地埋藏。另外，文化层分布在濠溪河现在的平水位以下，为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得以保留大量有机质材料。

经碳十四测年，遗址文化层年代超过常规测年上限(距今约4.35万年)，经光释光初步系统测年，遗址文化层距今约5-7万年，处在现代人起源扩散的关键阶段。

主要遗物遗存 经科学精细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全部系统采样(对文化层所有土样均收集作为多学科研究土样，其中2023年已收集浮选土样10913份)，遗址发现非常丰富多样的遗物。2023年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10.5万余件(现场编号石器和化石标本6865件，另从4445份(占浮选土样总量的40.7%)重浮样品中挑选出土制品碎屑15424件，化石碎屑82807件)，另有数以万计的植物遗存[294份(占总量2.7%)轻浮样品中挑选出30629件种子、果实，另有芽孢及残存的枝叶等32784件]和少量木器、骨器及其他遗存。另外，还发现有用火、切割、刻划、琢制等痕迹。

内涵与价值 初步综合研究表明，遗址的重要内涵价值包括以下5个方面。

一、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特别是极为丰富的植物遗存，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显著地增加了历史的丰度和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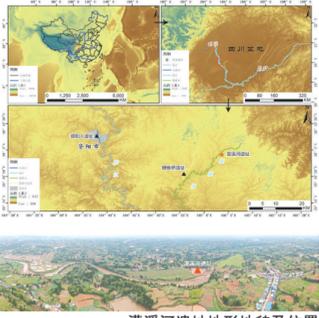
从生产工具上，发现石、骨、木等所有材质的工具，

是罕见的早期加工利用有机质材料的实证。

从生活对象中的动物遗存上，发现象、犀牛、熊、牛、鹿、猕猴、鱼、龟、蛇、蛙、鸟、豪猪、竹鼠等至少30多个种类，包含大小、水陆空、食肉食草类等几乎所有大类型的动物，显示出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深刻认识和广谱化的狩猎能力，是国内最早发现大规模水生动物遗存的遗址，最早发现鸟类和明确利用肉食动物的遗址之一。

从植物遗存上，发现从树木(例：最长约9.6米，树龄最大约210年)到果实、种子再到孢粉，极为丰富地保留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大量植物信息。普遍认为，旧石器社会是一个狩猎采集社会，但狩猎的证据尚不普遍，采集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能依靠想象和少量微观的微小植物化石，濠溪河遗址丰富多样且肉眼可见的植物遗存为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中的采集经济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证。遗址初步鉴定发现了柏科、壳斗科、豆科、桦木科、茜草科、蔷薇科、十字花科、石竹科、葫芦科、蓼科、莎草科等30余科的植物种子、果实。初步的种类、数量和比例分析表明，种子、果实以人类可食用范畴的为主，其中以坚果类的壳斗科(以水青冈为主，另有核桃、橡子等)、水果类的蔷薇科(以悬钩子属为主，另有桃、葡萄等)为主，另发现有块茎类的莎草科、部分种类(桃等)是目前国内甚至国际旧石器遗址中最早甚至唯一的发现，代表着古人对植物性资源的深刻认识和可能对相关植物的最早利用。植物的广谱化利用以往被认为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开始，本遗址的发现，将极大地改写史前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历史。另外，发现了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中医中治疗跌打损伤、舒筋活血的药用植物，可能蕴含着药用植物早期利用的行为。另外，极为丰富的全要素的动植物资源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环境、气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材料。

二、发现石器以特殊的硅化木作为主要原料并加工小型工具，是华南大的砾石石器传统中罕见的小石器组合，凸显出石器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和晚更新世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初步统计和岩性分析表明，整个濠溪河遗址群调查及发掘的石器超过95%是由硅化木作为



濠溪河遗址地形地貌及位置

意义的，极为丰富的全要素的动植物遗存也将推动我国在古植物、环境、气候及轮转年代学等领域的突破。

总体而言，遗址饱水环境下保留的系统、丰富的遗存蕴含着翔实的古环境背景、完善的生产(石、骨、木、生活(广谱的动植物资源)资料、多样的行为(工具加工、狩猎、采集、用火、切割、刻划等)以及古人类对早期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刻划)，从而能够全面立体地反映现代人起源扩散关键阶段的早期人类社会真实图景，是过去认为“简单”的旧石器时代复杂化的综合实证，也是旧石器时代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最佳例证，为深入探讨早期人类对特殊材料及有机材料的认识及加工利用方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广谱化、艺术萌芽和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国际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国际性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执笔：郑皓轩)

原料，是对单一特殊原料的强化利用；石器工具类型均以小型的刮削器为主，另有一定数量的小型凹缺器、尖状器、石钻及零星的砍砸器，是华南地区大的砾石石器传统中罕见的小石器组合，且持续稳定的长期存在于濠溪河流域。

三、多种本阶段罕见乃至国内甚至国际最早一批的复杂性行为的系列集中发现，对探讨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起源扩散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珍贵的信息。骨器、木器等有机质材料的加工利用，鸟、鱼、龟鳖、熊等特殊动物及从宏观到微观的丰富植物的发现与利用，在石器、骨骼甚至可能在植物上的刻划等，是国内甚至国际最早一批的发现，这些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现象和行为以往多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旧新过渡阶段才开始出现，过去在这么早的阶段发现其中一项都很重要，而在该遗址则成系列的发现，这更加凸显了遗址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另外，还有用火、切割等其他行为(例：同一区域内炭化的木头和烧过的剑齿象的上下颌，可能指示的是用火加工消费象头的行为；烧过的种子；在熊趾骨上的切割)。

四、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及背后系列行为的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和高分辨率地透物见人，可以极为罕见地复原一个立体而又复杂的旧石器社会场景，活化一个现代人起源扩散关键阶段的“不简单”的旧石器社会。

五、这是一个文理高度融合、多学科跨领域的重大发现，不仅是考古学意义的，极为丰富的全要素的动植物遗存也将推动我国在古植物、环境、气候及轮转年代学等领域的突破。

总体而言，遗址饱水环境下保留的系统、丰富的遗存蕴含着翔实的古环境背景、完善的生产(石、骨、木、生活(广谱的动植物资源)资料、多样的行为(工具加工、狩猎、采集、用火、切割、刻划等)以及古人类对早期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刻划)，从而能够全面立体地反映现代人起源扩散关键阶段的早期人类社会真实图景，是过去认为“简单”的旧石器时代复杂化的综合实证，也是旧石器时代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最佳例证，为深入探讨早期人类对特殊材料及有机材料的认识及加工利用方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广谱化、艺术萌芽和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国际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国际性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执笔：郑皓轩)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0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遗址地处豫东平原，地势平坦，北临睢水故道。2022年永城市文物局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初步判断遗址东西宽300米，南北长400米，总面积近12万平方米。2023年4至11月，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王庄遗址展开正式考古发掘，同时对遗址进行系统勘探。截至目前考古工作已取得丰硕成果：

考古勘探成果 在以往勘探的基础上，2023年对王庄遗址的核心区进行了密集勘探，最为重要的是在王庄遗址墓区外围发现一座环境设施。环境设施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方向约10度，总面积80000平方米；壕沟一般宽度在15至35米之间，东北角宽度超过50米并在北侧分出双重壕沟，壕沟开口距现今地表3.5米，壕沟沟底最深处距现今地表5.1米；壕沟北侧外壕正中与东南角均向外延伸，推测可能分别为环境进出水口所在。

钻探所见壕沟填土包含物主要有动物骨骼与大汶口文化陶片等，未见晚期遗物，据调查以往重要遗物的出土地点均在环境内，发掘揭露的大汶口文化墓地则在环境内中部偏东，据此推断环境的年代应大体与大汶口文化墓地同时，此外钻探表明壕沟以外仍有文化层分布，可以推测整个遗址的面积可达十几万平方米或者更大。

考古发掘成果 本年度王庄遗址发掘总面积350平方米，发掘区包括村南(Ⅲ区)、村中(Ⅳ区)两部分。

遗址Ⅲ区包括四个阶段的地层堆积：现代层、明清层、唐宋层、东周层，Ⅲ区目前发现并清理东周墓22座、宋墓1座、灰坑24个、灰沟1条。东周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多数南北向，少数东西向，皆为单人一次葬，部分墓葬有棺灰，葬式多仰身直肢，少数侧身屈肢，部分墓葬墓主骨骼不完整，一般随葬陶器2至4件，包括鼎、鬲、罐、豆、盆、孟等。灰坑数量较多，其中ⅢH1出土一件完整的鹿角及部分头骨。Ⅲ区发掘清理宋墓1座，该墓墓室系用板瓦筑成，人骨保存完整，出土棺钉数枚及唐宋铜钱59枚。

遗址Ⅳ区包括五个阶段的地层堆积：现代层、明清层、唐宋层、东周层、大汶口文化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Ⅳ区在约一百平方米的范围目前内已发现集中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墓葬12座，从晚期灰坑断面亦可看到部分大汶口文化墓葬暴露的迹象，因此可以判断这里的墓葬总数不止于此。此外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墓室东西向，墓主头向东，除ⅣM3为三个合葬墓以外其余皆为单人葬，葬式多为侧身葬，墓室偏居墓室北侧，多墓葬随葬品丰富，包括玉、石、骨、陶器等器类，其中部分陶器火候较低，陶质偏软。

ⅣM3是王庄遗址目前所见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墓葬。该墓为三人合葬墓，墓室分南、北两部分，其中北侧两具人骨仰身直肢，南侧一具侧身直肢，头向均略偏东南，墓室东部被东周灰坑H9打破，三具骨架头骨均缺失。墓口东西2.35米，南北3.38米，现存深约0.6米。随葬玉器20余件，其中在人骨颈、腹、腿部分别发现玉琀、玉镯、玉璧、玉坠、绿松石饰等，墓室中部偏西发现成组石圭。随葬陶器60余件，其中包括带兽首装饰的陶鬲、单把杯、背壶、鼎、罐、豆等，分别置于北侧二层台上与墓室中部。

ⅣM4为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2.54米，南北1.3米，深0.3米。墓室西北角被东周灰坑H5打破，该墓发现人骨一具，侧身直肢，整体偏居墓室北侧。随葬玉器34件，其中包括墓室颈部发现的一套项饰，由27件玉串珠、2件绿松石饰与1件玉璜组成，此外墓主头顶置石圭1件，颈骨左侧有绿松石饰1件。随葬陶器30余件，东西向呈三列置于墓室中南部，器类包括带盖的瓦足鼎、红陶鬲、背壶、罐、豆、器盖、盆、钵等。

ⅣM6为竖穴土坑墓，墓口长2.65米，宽1.26米，深约0.3米。发现人骨一具，位于墓室北侧，侧身直肢。墓主头骨附近随葬一组面饰，由23件玉器或绿松石片组成，形似玉覆面，墓主左手佩戴一組腕饰，由14件玉串珠组成。墓主右臂与腰部分别有1件大型动物牙齿，保存状况不佳。由于墓室南部被东周灰坑H11打破，部分陶器随葬较为破碎，总体数量20多件，器类包括背壶、贯耳壶、盆、豆、器盖等。

ⅣM8为竖穴土坑墓，墓口长2.56米，宽1.25米，墓室西侧与南侧西半部较高，似为熟土二层台，单人侧身直肢葬，墓主位于墓室北侧。随葬玉器6件，骨器10余件，墓主头骨左右两侧分别有玉璧、穿孔玉器1件，墓主左手附近置玉钺1件，右手执环首骨刀1件，墓主右臂部发现大型兽牙、獠牙各1件，墓室中部偏西发现石圭2件与经过切割的猪牙3件。随葬陶器约40余件，东西向四列陈设于墓室底部，器类包括背壶、钵、豆、鼎、罐、器盖等，其中一件红陶背壶体型瘦高，盘口直腹平底，器型上部形似制小尖底瓶，较为特别。

认识与收获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是此类遗存在商丘地区的首次发现，该遗址的发掘对揭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史前社会礼制，探讨中原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王庄大汶口文化聚落延续时间较长，聚落等级较高。据陶器形态判断该遗址早期墓地年代总体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墓葬所见多组叠压打破现象表明墓地使用了较长时期。遗址发现环境设施以及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的玉器、绿松石、石圭等随葬品，可见该遗址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高等级聚落。

其次，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并折射出显著的社会分化。遗址ⅣM6出土“玉覆面”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较早出现的组合葬玉形式，并具有显著的礼仪性质；遗址多座墓葬均出土石圭，并且此类遗存数量与墓葬的规模成正比，同时墓葬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与墓室规模高度相关，由此表明该遗址所代表的史前社会已具有一定的礼制规范并发生了显著的等级分化。

第三，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叠葬制”是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最为独特的葬俗。遗址发掘所见墓葬间存在多组打破关系，但不同寻常的是这些相互打破的墓葬均存在“墓室高度重合、上下距离贴近、随葬品堆放无清晰界限”等特征，即同组墓葬东西轴线相近，上下层墓葬人骨有些几乎在同一垂直线上，同时上下层墓葬垂直距离有些只有十几厘米，此外上下层墓葬的随葬品无间隔堆叠，有时较难判断所属。我们推测同组墓葬间墓主或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目前已提取部分墓葬的古DNA样本送检，具体结论尚需分析证实。

第四，初步研究表明王庄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可能代表着一个新的大汶口文化地方类型。王庄遗址史前文化总体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同时器物群中可见来自南方地区崧泽文化的贯耳壶，以及受中原仰韶文化影响的网格纹彩陶，但其地域性特征也十分显著，表现在墓葬以实用器随葬，单人葬多侧身直肢，墓室偏居于墓室北侧，这里出土的瘦长体背壶、带兽面装饰的陶鬲等都不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其他类型。(首都师范大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朱光华 周通 郑清森 岳洪彬 袁广阔)



大汶口文化玉器

贵州普定穿洞遗址

工作概况 穿洞遗址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西南，洞穴南北对穿，保存状况良好。遗址发现于1978年春，历经2次考古发掘，2022-2023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2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遗址文化堆积厚度超过6米，年代从距今约5.5万年前延续至距今8000年，跨越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罕见。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现墓葬3座、石制品1万余件、骨角制品2500余件、动物骨骼10万余件，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植物遗存，为探讨现代人出现与农业起源等两个史前考古重大课题增添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遗址发掘区布设1×1米探方，同一自然层内采用2厘米水平层向下发掘。尺寸2厘米以上出土物全部测量三维坐标；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产状信息；对所有的土样进行浮选、水筛，发现了骨器、装饰品、人类化石等重要遗物；对全部钙板进行适度的破碎处理，在处理第①层钙板时发现了人牙1枚；重要的活动面、典型的石制品进行三维建模。

地层与文化分期 普定穿洞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期(除去第一层现代层)，第一期分为①-③层，在第①层发现了晚期智人白齿化石1颗，遗物主要为石制品与动物化石，人类活动较少，未见任何遗迹。该期年代早于5.5万年。第二期分为④-⑩层，遗迹、遗物丰富，共发现灰坑7个、用火遗迹5个，遗物主要为骨制品、石制品与动物化石，⑤层发现了凹石1件，在其背面与凹坑中有明显的赭石粉末残留。该期年代距今约50000-12000年。第三期为⑪-⑬层，为人类活动最频繁时期，石质工具数量明显增多，磨制骨角制品大量出现，遗迹见墓葬3座、用火遗迹1个、灰坑2个，遗物主要为骨角制品、石制品、人类化石与动物化石。该期年代距今约12000-8000年。

重要发现 在此次发掘中，确定了⑩层存在明显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更新了以往认为穿洞⑩层不见任何遗物的认识；早年的发掘止于⑩层，此次发掘在⑩层下发现了4个新地层，最底层已到基岩，初步判断在距今5万年以前，穿洞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此后一直延续到距今8000年。

石制品原料选择以燧石、河滩砾石为主，类型为石核、石片、碎屑、断块、工具等。二期可为刮削器、尖状器、石钻、凹石、碾磨器等，第一期、第二期石制品以断块、石片为主，偶见工具，第三期工具数量剧增。从早到晚燧石工具绝大部分以断块为毛坯，初步判断该遗址的古人类倾向直接选择合适的断块作为工具的毛坯，再选择合适的断面结构修理出刃缘，这种选择毛坯和断面结构进而二次加工的倾向在砾石工具中亦见。目前来看穿洞遗址石器工业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料毛坯既有燧石断块也有砾石，而且前者数量丰富，与早前的认识有一定差异；二是从早期到晚，尤其是以燧石断块为毛坯的工具，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其刃口的类型在第三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

包括线性刃口和汇聚刃口内部也可见丰富的技术类型，与贵州及其他地区同时代以砾石为毛坯的石器工业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⑤层发现带有赭石残留的凹石，这可能指示了凹石的功能与赭石的加工有关。

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加工精致的有机质工具及装饰品是本次考古发掘的另一重大收获。在严格甄别并剔除埋藏学干扰因素的前提下，本次发掘共计出土骨角器2500余件，其中有明显刮削、磨制、抛光或刻槽等技术特征的磨制骨角器工具1500件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旧石器层位)，类型主要包括骨铲(500件)、骨锥(350余件)、骨矛头(100件左右)、骨箭头(80余件)、骨鱼钩(90件)、骨叉型器(4件)以及牙器(50余件)等。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穿洞是磨制骨器出土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这一发现为国内目前磨制骨器溯源、技术特征、时空框架及其与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同类型材料的对比研究以及重大人群的迁徙扩散、人口规模变化与文化交流互动等重大科学问题的探索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考古学材料；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石制品之外构建史前人群社会生活全景式画面的另一重要依托。穿洞遗址出土的有机质工具不仅包括相对完整的精美器型，还有大量的废料、残段、废品以及毛坯等，它们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史前人类对有机质原料(骨、角、牙)的选择、开发、利用以及废弃等行为的复原、阐释与对比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载体。穿洞遗址骨制品类型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在不同层位的变化(如骨铲与骨鱼钩数量在遗址第3、4层的逆相关关系)为我们厘清穿洞遗址史前人类的工业模式及其历时性变化提供了重要证据。在上述骨角工具之外，骨屑、贝壳串珠(90件)的发现也为中国西南史前人类艺术表征行为及其溯源的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初步鉴定结果显示，在早年发掘出土的猕猴、獾、熊、猪、鹿、犀等动物物种之外，本次发掘首次发现豪猪、竹鼠、象、牛、鸟、龟、鱼以及软体类等动物材料，它们在揭示区域气候环境背景与穿洞古人类工业模式及其历时性变化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目前植物考古的工作结果显示，在穿洞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地层中发现有部分猕猴桃属以及藜属的炭化植物种子。从植物本身来看，二者都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猕猴桃属植物果实酸甜多汁，营养丰富；藜属植物



第一期人类白齿



第三期 M3 人类下颌与随葬骨鱼钩

易于采集，茎叶与种子都可食用，它们很可能都属于当时穿洞遗址古代人类采集的重要对象。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3座墓葬，出土的人类骨骼包括未成年下颚2件和成年颅骨1件。随葬品共出5件，M1出土骨铲1件和骨锥1件；M2出土骨铲1件和骨鱼钩1件；M3出土骨鱼钩1件。其中，M2墓葬1座位于过火面的正下方，过火面上方为一块红色石块，墓葬中发现人类头骨碎片三十多片，呈水平状、规律的8层叠放，头骨碎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因火烧而灰化的状况。经初步鉴定该头骨应为一成年个体，仅剩脑颅部分。该标本可能是具有仪式性行为的特殊埋葬方式。上述墓葬及人骨的发展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遗传信息及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距今1万年左右二次葬的发现，也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葬式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遗址堆积下部(第11层)发现早期现代人白齿化石1颗，初步推断年代为距今5-6万年，填补了贵州地区该时段古人类遗存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于东亚地区晚更新世以来人类牙齿形态变异性的认识，为探索早期现代人牙齿形态变异和演化问题增添了新证据。上述材料表明，穿洞遗址是中国南方首个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墓葬材料共出的遗址，所埋藏的人类骨骼材料弥足珍贵。

价值与意义 穿洞遗址年代早于距今5.5万年，文化堆积厚度6米，跨越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堆积连续、内涵丰富，同时包含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过渡阶段墓葬，其中过渡阶段独特的头骨埋葬习俗，填补了东亚地区史前人类丧葬习俗的一项空白。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骨角制品，是研究东亚地区史前人类有机质材料开发利用模式及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如此长时段、连续的文化堆积和人类遗存，对于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技术发展模式、研究古人类体质演变与遗传过程，分析该区域古人群适应环境的能力与生存方式、探索东亚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现代人起源、演化、扩散和交流等重大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定穿洞遗址考古发掘，学术目标明确，多单位合作，多学科深度融合，整合了包括旧石器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年代学、埋藏学、古DNA与古蛋白分析等研究方向，是多学科、全技术考古研究的优秀案例。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普定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执笔：张兴龙 张双权 张乐 王湘粟 牛月明 袁光婷)



大汶口墓葬IV M3出土陶鬲